



1964年,中国与法国正式建交。六十年间,两国在艺术、人文、思想等领域交流不断,两国人民以文化构筑跨越山海的桥梁,在密切的沟通中理解彼此、欣赏彼此。

值此年终之际,羊城晚报特别策划推出“山海之间:中法文化60年”系列专题报道,探寻中法文化交流碰撞出的绚烂火花,展望两个文明大国友好往来的美好未来。

## 引进法国当代文学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

一出来,如果不第一时间去拿,可能就拿不到了。即便拿上,价格也相当高”。胡小陔说。2016年,海天出版社(深圳)出版社前身成立了胡小陔出版工作室,为书法作品引进和出口提供了许多政策上的便利。最突出的一点便是胡小陔有选题决定权,在商业谈判上抢得先机。“以前要开会讨论、上报、审批,层层通过后才能去谈版权,动辄三五个,但一本好书可能三五个小时就被买走了。现在可以做到我马上拍板。”

如今，胡小跃出版工作室每年出版约15本法国译作，今年重点推广的其中一本图书是《莫娜的眼睛》。这本书以10岁女孩莫娜和外公的故事串联起巴黎三大博物馆——卢浮宫、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艺术佳作。胡小跃看中它形式新颖，又有美育作用。这本书的版权竞争非常激烈，经过几个月的竞价，原稿出版社成功拿下版权，深圳的修改与中文版的翻译同步进行。“这本书由三部分组成，我们请了三位译者同时翻译。作者不断修改原稿，我们的译稿也同步修改。最后，这本书的中文版与法文版几乎做到了同步推出。”

而跳出文学层面，新书的及时引证，在文化交流上有着更深远的意思。我们不仅要读经典，还要读最新的作品。这些书并非每本都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佳作，但通过它们，我们可以了解法国的社会政治走向，文坛的新趋势。只有对当代社会有了解，才能更好地跟现在的法国人交流。试想一下，法国人来到中国，我们也不会老是谈西游和三国，总得聊点新东西，对吧？”

要做到及时引进,抢占先机非常重要。胡小跃说,图书版权交易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,尤其是热门书籍,“好的书

“引进来”也“走出去”，以交流消弭误解

胡小跃跟图书打了一辈子交道。他不仅做书、翻译，而且以书籍为圆心，开展了系列中法文化交流活动。早在1999年，他就为法国学生提供来中国实习的机会。2000年起，深圳读书月开始设立“法国图书日”，此后连续多年举办；从2001年起，他每年都邀请法国作家、出版人等不同群体来中国做活动，既提升法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力，也让法国人对中国有更直观的了解。

“接触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在民间层面推动两国人民的交流,可以消弭很多误解和偏见。很多人来了中国后发现,这里跟他们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的完全不同,对中国的看法大多有所改变。”

不仅“引进来”，胡小跃也带着中国图书“走出去”。自2017年起，他设立了“中法讲书团”，轮流在中国和法国的书店、书展、图书馆、文化沙龙做活动，介绍中法作家，推广中国文化。近年来，在深圳市

委宣传部的支持下,“中法讲书团”等中法文化交流活动更是越办越红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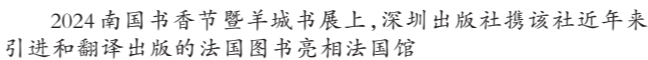
在胡小跃看来,要做大中国图书在法国的影响力,出版人任重而道远。法国人爱书也懂书,中国图书需要跟全世界的书籍同台竞争。同时,对法国读者而言,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增加了理解难度。“我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都做过调查,图书馆借得最多的中国图书是《孙子兵法》,老子、道子等中国哲学也很受欢迎。但是中国的当代文学,对法国人而言仍是陌生的。”胡小跃说,

“其实很多中国当代文学都已经翻译出去了,但落地效果仍有待改善。所以第一步是要让中国的图书能够进入法国书店,能够上架,读者想买能买到;第二步是要让读者读懂;第三步要让他们想读,愿意读,喜欢读。为此,要在法国多举办各种宣传活动,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和文学。”

与法国图书打交道这么多年，胡小跃时常在书中感受到启发和共鸣：“我翻译勒萨热的《乌合之众》时，虽然这本社会心理学著作的翻译难度很大，但过程非常愉快。书中的观念很有颠覆性，给我提供新的角度来观察社会，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提升。”在他看来，翻译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手段：“语言好并不等同于翻译好。译者必须对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所了解，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文学修养，才能译好一本著作。”他还鼓励译者多跟原作作联系，这样才可以避免许多误解和误译。

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,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。胡小秋今年尤其忙碌,先后组织并参加了深圳读书月中文文化交流特别活动、中法文化之春框架下的“在文学艺术中旅游”第四届首尔艺术节中国评选、南国书香节“60年,法国文学在中国”文学对话、深圳出版社法国图书书展等活动。他期待,中法文化交流能高质量地持续下去。“文化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、建立互信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交流才有了解,有了解才能互学互鉴,有学习才能一起进步。”

首本法语译作《母猪女郎》半年重印三次



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法国总与“浪漫”二字挂钩，但胡小跃眼中的法国拥有副先锋的面孔。“很多法国人都反问我：‘你们老说我们浪漫，到底浪漫在哪里？’”胡小跃笑着说，“可能是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里那些奔放、不顾一切的爱情给我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。但法国文学除了爱情，还有很多实验的、探索性的东西，世界上很多文学流派都从法国开始。”

因此,胡小跃的选书标准之一就是独创性。他略过一般的通俗小说,专注于寻找或是题材有突破,或是表现手法有特色的作品。他在出版社引进的第一本法图图书馆是玛丽·达利耶塞克(Marie Darrieussecq)的首部小说《母怪女郎》。“这本小说的写法很独特,把当代社会的现象放到一些魔幻的场景里,真真假假搞不清楚,有点像卡夫卡的写法。”胡小跃介绍,“这位

作者虽然是第一次写小说，但是情节、语言都很好，在法国和中国都卖得很不错。”《母猪女郎》中文版在1998年出版，首印5000本在两个月之内就售罄，半年里重印了三次。

但并非每一本书都能如此畅销。在胡小跃看来，法国文学特立独行，阅读门槛相较英美文学要高。“英美的作家写作时心里有读者，法国的作家只有他自己。”他笑说，“法国人强调自我表达，而且在文学上极具创造精神，常把哲学、社会学等学术知识融入其中。这是法国文学的特色，但也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”《母猪女郎》成功之后，胡小跃引进了玛丽·达利耶塞克的其他作品，可惜销量平平。“她成名后要挖掘更深的思想内容，表达内心的东西。作家的地位越来越高，但读者越来越少，这的确是一种遗憾。后来我在

采访龚古尔奖评委会主席埃德蒙德·夏尔-鲁时说起这件事，她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：‘读者少了不一定是作者的错，说不定是读者的错呢？’她觉得读者要跟上作家的步伐，提升自己的欣赏水平。”

为这些作品找到甚至培育合适的读者，这就是出版人的功课。不同于自带知名度的经典作品，新作品和新作家在中国的推广更需巧计。二十多年来，从最开始在报纸发书评、书讯，到举办新书交流会等线下活动，再到最近试水直播卖书，胡小跃做了大量的工作，积累了一批热心读者。“我们每次办活动都能碰到几个很热情的读者，他们会把七八年前出的书都买齐，带过来找我们签名。有些人还会跟着我们跑活动，每一场都能见到他们。我们挺受鼓舞的，觉得的确应该继续下去，而且要做好。”

## 从无到有敲开法国出版界大门

胡小跃与法语的缘分始于大学。他的大学专业是法语,法国文学浩如烟海、佳作众多,对一位文艺青年来说,能阅读原作自然是如虎添翼。他逐渐发现,有很多优秀的法国文学作品还没翻译成中文,他便着手尝试,对法国文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。

大学毕业后,胡小跃没有直接进入出版业。他辗转了许多城市、换了好几份工作,唯独对法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始终没有中断。1998年,他决定放弃其他工作,到出版社去。当时,出版社的外国文学业务几乎一片空白,胡小跃在新成立的海外部决定先集中力量做法国文学。

当时，国内大部分出版社对外国图书引进业务保持观望状态。中国在进行多年的保持了国际版权组织协议，引进外国图书从此需要事前取得版权。在好几年的时间里，出版社对涉外版权业务不熟悉，只能出版世界名著等公版书，对外国新作品的引进几乎陷入停滞。“版权找谁谈，合同怎么签，外汇怎么付，这都是很复杂的事。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做。”胡小跃回忆，“但到了1996年左右，大家都感觉实在不行了，必须要去谈版权，便尝试跟外面建立联系。”来到出版社工作三个月后，胡小跃决定亲自到巴黎走一趟。

从无到有的开拓自然是最难的。刚到巴黎,胡小跃吃了不

少闭门羹。“巴黎的出版社没怎么跟中国打过交道，不熟悉，也不信任。很多时候是电话打过去，对方一听，之前没合作过，就找各种理由不愿意意见你。直接上门也不行，在前台就被拦下。找来出版社的传真号码一家家发过去，也基本没有回音。”

不断碰壁之后，胡小跃终于找到了突破口：“后来我联系上了一些管理机构，比如法国的出版业协会、法国文化部下属的对外交流部门，他们在内刊上发表了文章，介绍了我的情况，再打电话和发传真过去，回复就变多了。”

内刊的介绍只是敲门砖。胡小跃凭借着对法国文学的熟悉和喜爱，让巴黎的出版人有了惺惺相惜之感。三四个月的时间，谈下近20本书的版权，几乎整个法国出版界都知道了有这样一位来自中国的出版人。“那时候每天都抱一大摞书回来，或者直接在出版社挑，基本把法国当时最畅销的小说和社科类图书都谈下了。”

二十多年后再回看这趟巴黎“猎书”之旅，胡小跃仍觉得收获巨大。“当时拜访了大量的作家、出版人，建立了很好的关系，又由于我基本是第一个来谈版权的人，他们对我寄予厚望。后来也不断地把书和资料发给我，甚至有点应接不暇。互联网普及了之后，联系也更方便了。”

